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言

方广铝

—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反帝运动，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进行镇压。八国联军攻陷紫禁城，大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第二年，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意、法、西、荷、比等十一国签定屈辱的《辛丑条约》。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正当首都北京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远离战火硝烟数千里之外的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偶然地在一个洞窟甬道的墙壁中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弃的耳窟，其中装满了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的古代遗书与文物。这个洞窟，后来编为第17窟，被人们称为藏经洞。

据说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即向敦煌县政府作了报告。但没有引起县政府及当地士绅的充分重视。其后，王圆箓将洞内一些文物作为礼品馈赠各色人等，敦煌文物因此辗转流散。1907年、1908年，时任职于英属印度政府的斯坦因与任职于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的伯希和先后闻讯来到莫高窟，以不光彩手段骗得大批敦煌遗书与其他文物，捆载以去。迨消息为北京学者得知，1910

年，在中国学者们的呼吁下，清政府学部咨甘肃学台，令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敦煌运京的这批遗书成为国家图书馆敦煌特藏的主体部分。此外，四十年代，国家图书馆曾遣人赴西北，求购到若干流散于民间的敦煌遗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陆续将散藏于各地及散逸于民间的不少敦煌遗书调拨或收购后移交国家图书馆，集中保管；不少人士纷纷将自己珍藏的敦煌遗书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自己亦求购到部分敦煌遗书。凡此种种，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特藏，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达16000余号。几十年来，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分批、分阶段进行整理、编目与修复，形成目前四大单元的收藏现状。

二

下面按照四大单元的顺序介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及其整理与编目的情况。

（一）劫余录部分

即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所著录的部分。

清宣统二年（1910），学部下令将敦煌藏经洞剩余遗书悉数解京。由于当时政治腐败，起运前，王圆箓藏掖转移若干；运京途中续有流失；抵京后又有监押自盗。剩余卷子全部移交部立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就中挑选出较为完整的，正式编为8679号。编号的方法是按照《千字文》顺序逐一用字排号，从“地”字到“位”字，每字系100号。空缺“天”、“玄”、“火”等三字未用。并编纂了国家图书馆历史上第一个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该目录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八册，并录副一部。著录内容为编号、长度、起止字等，属防盗式的财产帐。在每号

天头分别标注库内皮藏号，每号地脚则标注经名。该目录反映了这批敦煌遗书在国家图书馆的早期收藏、整理情况。由于赠送奥地利博物院、赠送张謇、提存历史博物馆、原缺、被盗、遗失等情况，至二十年代，这批遗书实存 8653 号。

1922 年，陈垣先生任馆长时期，以《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为基础，编纂了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该目录修订后于 1931 年 3 月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著录内容为编号、起止字、纸数、行数、品次、附记等。《敦煌劫余录》所著录虽为上述之 8653 号，但因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时有一号多件的情况，而《敦煌劫余录》大体按照一件一款的原则著录，故《敦煌劫余录》共著录 8700 多款。解放后国家图书馆为这一部分敦煌遗书拍摄缩微胶卷时，依《敦煌劫余录》顺序重新给号，剔除前述已经不存的遗书，其余遗书一款一号，共编成 8738 号。故此，国家图书馆的这一部分敦煌遗书现有两种编号：一是千字文号；一是缩微胶卷号，亦即《敦煌劫余录》的顺序号。两种编号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陈晶、王新同志编纂的《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索引》可供两号互检之用。

二十年代，馆内成立写经组。据现有资料，先后参加过写经组工作的先生有徐鸿宝、胡鸣盛、李炳寅、徐声聪、张书勋、陈熙贤、于道泉、许国霖、李兴辉、孙楷第、朱福荣、王廷燮、王少云、马淮等。写经组的主要工作是为馆藏敦煌遗书编纂目录。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到 1935 年初，已为原《敦煌劫余录》著录的这部分遗书重新编纂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分类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著录内容包括编号、起止字，长度、纸数、行数、起止之卷品及经文，皮藏号数（空）、总目号数、备考等。时而还有一些简略的考订及说明。可惜的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华北局势动荡，为防止意外的损失，于 1935 年～1936 年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以避战乱，写经组工作陷于停顿，已

编好的《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索引未及最后修订定稿，也被束之高阁。为彰显前辈的劳绩，该目录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二）详目续编部分

解京的敦煌遗书经第一次挑选出 8000 余号之后，尚有一批残余。约 1927 年前后，由写经组从中继续清点、整理出 1192 号相对比较完整的遗书，亦依《千字文》排字，每字系 100 号。因上接《敦煌劫余录》部分，故第二批遗书的千字文编号从“让”字开始，共用了“让、国、有、虞、陶、唐、周、发、殷、汤、坐、朝”等十二个字。中间空缺“吊、民、伐、罪”四字，或与时值北伐，有所忌避有关。写经组仿上述《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的体例，也为这批遗书编纂了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该目录初稿亦完成于 1935 年前，同样被埋没五十余年。亦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许国霖编于 1936 年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目录》采撷了这批遗书的部分资料。

（三）残卷部分

解京的敦煌遗书经过上述两次整理编目，尚余残片两木箱，存放在善本书库中，年深日久，渐被遗忘。1990 年春，善本部搬库，得以“再发现”。这些残片大抵为长约 20—30 厘米、乃至更小之残片，残破情形不等。间或也有一些较长的卷子，但均为纸质较软已糟朽或纸质特硬已脆坏，不易打开者。并有一批引首与素纸。总计近四千号，已纳入新编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四）新字号部分

除甘肃解京的敦煌遗书外，国家图书馆于其后几十年间陆续收藏一大批敦煌遗书。其主体部分编为 1600 余号，冠以“新”字，以与前此的缩微胶卷号相区别，故一般称之为“新字号”。另有若干编为“简编号”，与新字号遗书一同存放。从入藏时代说，这批

遗书可分作解放前入藏及解放后入藏两大部分。解放后入藏的，又可分作“文革”之前与“文革”之后两部分。其中属解放前入藏的遗书数量较少，属“文革”之后入藏的也较少，绝大部分为解放之后，“文革”之前入藏的。从入藏来源说，则可分由文化部调拨、个人捐赠及国家图书馆求购三种，其中由文化部调拨的占绝大部分。

从这批遗书的流传渊源讲，它们又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原藏旅顺博物馆之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另一类是藏经洞自1900年被发现后便逐渐散逸到私人手中之遗书及由甘肃解京后被人盗窃从而散逸在私人手中之遗书。大谷敦煌遗书自被大谷光瑞转让后，长期由旅顺博物馆保管。1954年，由文化部将其调拨到国家图书馆。第二类遗书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它们大都系从敦煌遗书中挑拣出来，故从总体上讲，它们的研究价值、文物价值较高，其中不乏稀世之珍。有不少是当年罗振玉、刘幼云等人的收藏品。在此还要着重指出的是，几十年来，不少先生为了祖国的文化繁荣、学术昌盛，将自己珍藏的敦煌遗书捐赠或转让给国家图书馆。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义举。

应该说明的是，这批资料并非全都是敦煌遗书，其中有若干日本写经，有若干解放后从其它地方出土的唐、宋写经，也有敦煌遗书与吐鲁番遗书的照片、敦煌遗书的过录本乃至若干赝品。这些情况，在善本部内部使用的装箱目录中有所记录。但由于上述非敦煌资料是与敦煌遗书一起移交善本部的，按照善本部登录与保管的惯例，它们便与敦煌遗书一起登录，并暂时存放在一起。八十年代初，善本部将这批资料摄为缩微胶卷，其后又将其中1056号的片头卡片汇总在一起，编纂为《敦煌劫余录续编》，油印后供工作人员内部参考。由于不是正式出版物，因此未将其中的若干非敦煌资料剔除。后来，《敦煌劫余录续编》逐渐外流，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综上所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的总数在 16000 号以上，其中较大的卷子约有 10000 号，其余为残卷或残片。前此先后编纂的目录有《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敦煌劫余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敦煌劫余录续编》等五种，涵括馆藏敦煌遗书 11000 号左右。其中《敦煌劫余录》属正式刊行，《敦煌劫余录续编》系非正式流通，其余三种有待公布。

1983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加强敦煌遗书目录的编纂日益成为全体敦煌学研究者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从 1984 年起，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安排，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及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支持下，涵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敦煌遗书的总目录的编纂工作开始起步。其后经过 1990 年冬的重组班子，于 1991 年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纂工作再次正式开始。现目录初稿已经完成，正在定稿。我们相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最终完成与出版，将能够为研究者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提供一个便利的工具。

三

下面简单介绍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

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十分珍视，将它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称为“四大镇库之宝”。但敦煌遗书是被废弃的古代遗书，大多残破不全，若不修复则无法编目、拍摄及提供阅览。

国家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修复亦极其重视，极其谨慎。除了曾经对个别实在残破的经卷作过简单的技术处理，对个别经卷作过装裱外，直到九十年代，基本上没有对这些遗书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复。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比较科学的修复方法，因此宁肯让

它原封不动，也不草率处理。八十年代，国家图书馆曾经计划开展这项工作，为此先用几个经卷作试验。方法仍是传统的托裱。但修复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停顿下来。

九十年代以来，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充分考察了国外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善本部与善本部所属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讨论，制定了自己独特的修整方案。该方案的基本内容是：

（一）在指导思想，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方针，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是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二）在修复方法上，坚决摒弃传统的通卷托裱，采取对原卷的保存现状与残破现状作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的原则，妥善处理“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以保障研究者的使用与保管者的管理；又做到尽量少修，尽量保持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卷子原状，尽量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

（三）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避免因修复工作而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

（四）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即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形态造成任何不可逆转的变化。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可以消除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也就是说，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造成任何损害，如有必要，随时可以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书。

上述修复原则与方法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在图书修整组的努力下，上述原则得到较好的贯彻。图书修整组由此所展开的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可用“多快好省”四个字来评价。从而使大批本来已经无法上手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能够从此为研究者所使用。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曾称“纸寿千年”。敦煌遗书发现的本身已经突破了千年。藏经洞开启至今已有百年，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现状看，其形态与开启之初相比，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可以预期，这批敦煌遗书将在人们精心的保护下，子子孙孙永远留存下去。

四

几十年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经都被外国探险家挑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保存的是一批研究价值不大的糟粕。这不是事实。

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当时藏经洞的敦煌遗书捆扎为包，王道士成包地搬给斯坦因，斯坦因本人基本上没有自由挑选的余地。斯坦因不懂中文，也没有挑选的能力。他的助手蒋孝琬办事干练，但学问不多，在挑选卷子方面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其次到敦煌的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他虽然进入藏经洞，得以任意挑选。但第一，伯希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非汉文文献等。此外，伯希和还比较注意选择有特点的遗书，如石刻拓片、折装本等等。由于他不懂佛教，对佛教文献，则主要选取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以及佛经目录等。由于藏经洞遗书以佛经为主，这就限制了伯希和挑选的水平。第二，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时，洞中还有较为完整的

遗书二万件以上。伯希和自称费时三周，以每天一千件的速度全部查阅了一遍，自认为把精华囊括无余。但一个卷子，打开到最后，检查有无题记，然后再卷起，相当费时。每天看一千件，他只能粗略地翻检。他所选走的，不过是精华的一部分。

1910年，敦煌遗书启运到北京，有关人员上下其手，监守自盗。这些所谓的士大夫，熟谙中国的传统学问与文化，又有充分的时间。这一次偷盗，集中在非佛教的文献。所盗的佛教文献也大抵局限在比较完整、带有题记、抄写精美等几方面，因此，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劫难。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国家图书馆或国内其他图书馆、博物馆。仅有少量流散在私人手中，或者流散到国外。

早在三十年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就已经列举大量事实，批驳了所谓国家图书馆所藏是“糟粕空存”的说法。他说：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

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

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著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

《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

《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

《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

.....

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

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

陈寅恪先生的话还是针对当年的《敦煌劫余录》所著录的8000余卷遗书说的。而在其后整理的详目续编部分与残片部分中，以及其后回归国家图书馆的流散遗书中，都发现大量珍贵的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列子》、《文选》、《刘子新论》乃至天文历法、阴阳占卜、诗歌变文、酒令舞谱、文字音韵、道教文献等等。至于佛教典籍，更是美不胜收。可以说，在大量流散的精华文献重新回到国家图书馆的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绝对量或文字绝对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我相信，读者在翻阅了全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之后会得出与我们相同的结论。总之，无论是佛教研究领域，还是非佛教研究领域，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都有不少难得一睹的稀珍资料，只是有的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有的还正在等待着研究者去发掘。

这里还想提一下敦煌遗书中的书籍装帧史资料。书籍装帧以书籍载体为依托，随着书籍载体的变化而变化。自纸张作为书籍载体之后，我国古代的书籍在晚唐五代以前以卷轴装为主，自北宋起以书册装（包括蝶装与线装）为主。而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我国的书籍正好处在书籍装帧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书籍装帧的不定型。敦煌遗书向人们展示了这个过渡时期各种装帧形式的具体实物，成为我们研究书籍装帧史的重要依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不仅有大量的卷轴装实物，还

有梵夹装、经折装、缝绩装、粘叶装、粘叶线装乃至混合装等种种实物。资料之丰富，实为世界少有。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甚至保留了一千多年前的汉文梵夹装的原夹板，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五

敦煌遗书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文献研究价值与文字研究价值。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以敦煌遗书为主要代表的敦煌文物进行系统研究，开创了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敦煌学。陈寅恪先生曾经著文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而敦煌学就是“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产生以来，在中国中古史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社会、法律、宗教、音韵、医药、音乐、美术、舞蹈、以及民族史、边疆史乃至书法、绘画等诸多方面取得众多成就。它对中国中古史研究推动之大，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因此，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简、故宫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之一。

敦煌学虽然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由于敦煌遗书散藏在世界各地，一般人很难见到。这就使敦煌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很多研究者在展开自己的课题研究时，往往很难知道敦煌遗书中是否存在着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这些资料。由此不得不留下遗憾，也使得许多研究者将利用敦煌遗书从事研究视为畏途。其次，由于一般人很难见到敦煌遗书，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很多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大抵根据其他学者的录文进行。由于敦煌遗书绝大部分为写本，写本因其固有的性质，在文字书写与文本内容方面往往各有特点。例如所写文字多古体字、俗字、异体字、假借字、乃至方音字等等；在文本内容上也极易出现传抄的讹误，乃

至形成异本。由于敦煌遗书横亘年代长、涉及地域广，抄写者身份复杂、水平不一，使得上述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录文质量的高低直接制约了研究者研究成果的水平。

近十余年来，上述情况有所改变，各单位收藏的敦煌遗书的图版开始陆续出版。如前所述，敦煌遗书具有文物、文献、文字等三方面的价值，图版的公布，可以使研究者比较方便、有效地利用敦煌遗书的文献研究价值与文字研究价值，从而将促使敦煌学更加迅速而健康的发展。

当前，国内外有些图书、文博部门，以及部分个人收藏家，经常把自己收藏的敦煌遗书秘不示人。其实，文献资料要公开、要研究，才能实现与发展其价值。秘藏起来，资料就死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向秉承“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传统，努力公开资料，提倡资源共享。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劫余录部分”，曾于五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末两度摄制成缩微胶卷。五十年代的缩微胶卷赠送印度；七十年代的缩微胶卷则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馆际交换。其后，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未与国家图书馆联系，便在所出版的《敦煌宝藏》中利用该缩微胶卷公布了“劫余录部分”8738号的全部图版。由于当年国家图书馆拍摄这批缩微胶卷时，所藏敦煌遗书还未及修复，若干遗书首尾残破，皱折迭压；若干遗书墨痕深浅不一，有时难以辨认；也有若干遗书背面尚有内容，拍摄时遗漏。凡此种种，影响了缩微胶卷及《敦煌宝藏》的利用。此外，《敦煌宝藏》印刷亦有错乱图版等情况。

为了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敦煌遗书这份民族的瑰宝，推动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图书馆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合作，决定将馆藏敦煌遗书全部重新拍摄，编辑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印出版。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我们相信，在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下，这一工程一定会功德圆满。

六

以下介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号情况。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形成四个大的收藏单元，并由此出现不同的编号。至今，这些敦煌遗书使用过如下四种编号：

（一）千字文编号，从“地”到“朝”，涵盖了“劫余录部分”与“详目续编部分”，共计 9845 号。

（二）缩微胶卷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涵盖了“劫余录部分”，计 8738 号。

（三）新字号，采用阿拉伯数字，编入者主要为解放后入藏的敦煌遗书，计 1600 多号。

（四）简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编入者亦为解放后入藏的敦煌遗书，但数量较少，编号跳跃。

上述四种编号，前三种已被广泛使用，但使用方法并不统一。有的在千字文编号前附缀“北”或“北图”，有的不加。有的将缩微胶卷号称为“北××号”，将新字号称为“北新××号”，以示区别。但有的将新字号直接称为“北××号”。如此等等，给使用者造成不便。

为了避免混乱，有必要对全部馆藏敦煌遗书划一编号。考虑到目前已经有四种编号，如果增加新的编号，就会增添新的混乱。故最初曾计划在上述四种编号中选取一种，作为统一的编号使用。由于国家图书馆馆藏遗书共为 16000 余号，而千字文号已经编入近万号，涵盖了大部分遗书，所以决定采用千字文编号作为通贯全部馆藏遗书的唯一编号。但在广泛征求国内外敦煌学界的意见时，上述方案遭到学者们普遍的反反对。大家认为，用一个统一的编号通贯全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确非常必要，但《千字文》这一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早已过时，现在的人们对它的

排字顺序非常生疏。采用《千字文》作编号，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应该采用国际通用，方便易晓的阿拉伯数字作编号。大家提出，只要加上适当的字头标识，新的统一的编号自然可以与前此的诸种编号区别开来，不会造成混乱。再加上编制必要的索引，使新旧编号互检。这样，便可以达到既使用方便，又有新旧衔接之效。

接受上述意见，我们决定采用阿拉伯数字作为新的统一的编号。为了与前此已经使用的诸阿拉伯数字编号以及“北”、“北新”等标志相区别，新的编号以“北敦”为字头，意为“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罗马字简写则为“BD”。阿拉伯数字为5位，不够5位的以“0”补足。

“北敦”号的给号方法以“一件一号”为第一原则，以“一个主题内容一号”为第二原则。所谓“一件”指外观上独立的一件敦煌遗书，此时不考虑它的长度或宽度。所谓“一个主题内容”指所抄写的文献主题独立，可以单独成文。印章、杂写、题记等附着于其他文献的内容则为非主题内容，不予单独编号。当第一原则与第二原则统一时，遗书的编号成为标准形态，即“北敦×××××号”。如果第一原则与第二原则不统一，即当同一件遗书分别抄写了几个不同主题内容的文献时，则以给小号的方法来区别之。小号的给法是：如果该文献抄写在遗书的背面，则附记“背”表示之，如“北敦×××××号背”；如果同一面抄写有不同的文献，则用小数点以分数表示之，如“北敦×××××.1号”、“北敦×××××.2号”、“北敦×××××号背.1”、“北敦×××××号背.2”等。

由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前此已经有多种编号，这些编号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北敦”号必须考虑与前此各种编号的衔接。为此，“北敦”号给号的第三原则是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每一个原编号，都与一个“北敦”号、也仅仅只与一个“北敦”号相对

应。由于前此编号时往往有一个编号下系数件敦煌遗书的情况，因此，凡属这种情况，在“北敦”号中均用加 A、B、C、D……的方法来表示。如某号下原系有三件敦煌遗书，外观相互独立。则该号改编为“北敦”号时，诸件遗书分别编为“北敦×××××号 A”、“北敦×××××号 B”、“北敦×××××号 C”。如果这些遗书上抄有不同主题内容的文献，则根据情况，分别编为“北敦×××××号 A.1”、“北敦×××××号 A.2”、“北敦×××××号 A 背.1”、“北敦×××××号 A 背.2”、“北敦×××××号 B”、“北敦×××××号 B 背”等等。

为了不打乱历史形成的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四大收藏单元的现状，也为了尽量照顾新旧编号的衔接，“北敦”号按照“劫余录部分”、“详目续编部分”、“残片部分”、“新字号部分”这一顺序，逐一给号。

为了使读者掌握“北敦”号与原编号的对照关系，我们在每册图版的最后都罗列了该册图版所公布的敦煌遗书的新旧编号对照索引，供参看。

七

下面交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出版安排。

按照惯例，敦煌遗书编号时，不分遗书大小，每一个独立件就编为一号。因此，各收藏单位敦煌遗书编号的数量并不实际反映遗书本身的多少。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的四大收藏单元中，“劫余录部分”的编号虽然只占总号数的二分之一强，但它实际的份量，约占到馆藏敦煌遗书的九分之六。“新字号部分”编号不多，但实际份量约占全部遗书的九分之二。下余的“详目续编部分”与“残片部分”虽有 5000 多号，但实际份量只有总量的九分之一。

按照《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前的开本与容量，国

家图书馆的全部敦煌遗书大约可以编辑为 100 册左右。即使按照每年出版 10 册的速度计算，全部出齐也需要 10 年。由于“劫余录部分”编排在前面，数量最大，总共大约需要编辑为 60 余册，亦即如果机械地按照顺序出版，则至少需用六、七年的时间才能够将“劫余录部分”出版完，人们要到七、八年以后才能看到其余遗书。由于国家图书馆已经公布过“劫余录部分”的缩微胶卷，《敦煌宝藏》已经出版，人们比较熟悉。相对来说，人们更加希望能尽快看到至今国家图书馆尚未正式公布的“新字号部分”、“详目续编部分”与“残片部分”等敦煌遗书。

为了满足各界读者的愿望，我们采取分单位多头并进的方式出版图版本，以尽快将新资料送到读者面前。具体方法是：“劫余录部分”为一个单位，1998 年出版 2 册；“详目续编部分”与“残片部分”合作一个单位，1998 年出版 1 册；“新字号部分”作为一个单位，1998 年出版 2 册。这样，1998 年总计出版 5 册，其中 3 册均为未曾公布过的新资料。以后每年仍按照上述三个单位分头齐进，并根据工作进度调整出版计划，以尽快完成总的出版计划。

如前所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目前尚未最后完成。该目录篇幅较大，定稿、出版均需时日。为了使读者对所发表的敦煌遗书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特意对每号遗书撰写一篇简要的叙录，作为附录，附于每册图版的最后。叙录主要介绍图版上无法反映，或必须根据原件才能够更好地反映的内容。个别遗书略加考证或说明。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辑工作得到国内外敦煌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大力支持，先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南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得到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国家图书馆各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先后参加这一工作的馆内外人员达 30 多人，在此特对上述单位及参加者与关心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关于“文字最多的藏书印”

《文献》1992 年第 1 期 246 页刊登了一则短文《文字最多的藏书印》，谓“清朝阳湖藏书家杨继振的藏书印，印文共有 159 个字，可能是文字最多的藏书印”。昔年我在北大看书，曾见过杨继振这方印，钤盖在他所收藏的明正德十三年常州府刻《文公家礼仪节》卷首。是长方宋体字大印，印文实有 252 个字，照录如下：

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佚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予藏书数十万卷，率皆卷□□整，标识分明，未敢轻事丹黄，造劫楮素。至简首卷尾，钤朱累累，则独至之癖，不减墨林，窃用自喜，究之于书，不为无补。

书上还钤有杨继振各式藏书印，确如杨氏在这方大印中所说“简首卷尾，钤朱累累，则独至之癖，不减墨林”。前文所录印文漏掉“予藏书数十万卷”以下一段。《历代藏书家辞典》（1991 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杨继振”条，所录印文亦无“予藏书数十万卷”以下一段，因就所见补充如上。

• 杜泽逊 •